

本期专题 第四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

- 02 全球化新时代智库应如何创新发展
- 03 国际化智库和智库国际化
- 05 信息化时代如何提升智库管理和人才培养
- 07 中美贸易摩擦下，两国智库的角色及合作
- 08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智库创新

全球大观

- 10 全球治理与中国视野

经济纵横

- 14 中国是发达国家了吗？

科技前沿

- 17 关于中国 5G 牌照的深度研判

悦读时光

- 封三 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

编者按：2019年5月28日-6月4日，第四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持续捕捉全球局势变化的最新特点和全球智库发展的迫切问题，聚焦大国竞争背景下智库面临的挑战和可发挥的作用，并以此为背景深入探讨实现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创新模式。论坛汇聚了中外顶级智库专家和学者参与研讨，对新形势下的智库创新、智库国际化、智库管理与人才培养、智库合作等智库领域关键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当下，大国间在经贸、政治，乃至科技、文化、人才等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在传统的政府间官方外交往来之外，社会各界正寻求以新的方式改进国家间关系。不同国家间拥有政策影响力的智库的相互合作，对国家关系的改善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由全球化智库（CCG）发起，旨在关注全球智库行业在发展与创新领域新趋势，促进全球智库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间的交流合作，以更好地承担当代智库的历史使命。

作为在中国举办的全球智库论坛，“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至2019年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全球数十个国家、国际组织，上百家智库，数百名海内外战略、经济、商业领域的研究机构和团体代表参与了往届活动。凝聚全球智库共识，“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已形成国际会议品牌，就智库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展开思想碰撞，积极探求前瞻性、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本期推出“第四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专题，围绕“新时代智库应如何创新发展”、“信息化时代如何提升智库管理和人才培养”、“中美贸易摩擦下两国智库如何看待智库的角色及合作”等问题，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聚焦全球局势变化的最新特点和全球智库发展的迫切问题，探讨实现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创新模式。希望为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他栏目的文章也期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戈建虎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全球化新时代智库 应如何创新发展

2019年5月28日，由全球化智库（CCG）、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主办，团结香港基金、宾大沃顿中国中心及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协办的第四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在京举行。本届论坛聚焦于全球局势变化的最新特点和全球智库发展的迫切问题，并以此为背景探讨实现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创新模式。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全球化呈现出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快、多边经贸关系不稳定、科技革新影响大的新特点，人类原有的生活、生产乃至知识创造方式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不断改变。全球化一方面为智库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为智库发展提出了更多挑战。在此背景下，本场分论坛以“全球化4.0时代的智库创新——国际经验与中国视野”为主题，聚集全球顶尖智库专家，围绕目前全球化呈现的关键特点，全球化背景下智库进行创新发展的路径，国际智库在应对全球化发展的经验借鉴和结合中国智库创新转型发展模式进行深入探讨交流，为智库在全球化时代发展提出许多可行性建议。

## 创新智库发展模式，推动跨领域的政策研究

智库不同于大学等其他研究机构，它具有更自由的研究功能和更佳灵活的研究方法。智库通常以研究推动政策制定与改善为任务，而这种研究需要建立在对政策制定背景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因此推动跨领域的政策

研究十分必要。在推动政策发展过程中，智库还应该探索更多新方式将智库成果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转化为不同的呈现形式。中国智库在创新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借鉴其他国际智库发展的经验，通过国际化的方式，学习更多的研究方法，提高自己的传播技术，从而在夯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高智库的政策影响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任 James G. McGann）

## 在全球化发展新阶段，智库责任艰巨

随着国际社会的变化，政策制定非常重要，因此智库作用更为关键。在政治体制逐渐分崩离析的背景下，智库现在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加艰巨。在习近平主席的带领下，中国智库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习主席在前不久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讲话中多次提到“相互学习”这一概念，为智库创新转型指明了重要方向。我认为现在 CCG 做的工作令人骄傲，为其他智库发展提供了许多借鉴经验。CCG 在中美两国关系中间所做的正向努力令人十分欣喜。在中国智库发展过程中，应该积极学习更多国际智库发展经验。这也是本场论坛的重要意义之一。（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 Alistair Michie（麦启安））

## 时代变化下智库挑战接踵而至

团结香港基金不仅是智库，更有希望成为思想的推动者。在推动政策发展的过程中，团结香港基金会感觉到互联网飞速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比如有民粹主义不断抬头和由此带来的矛盾冲突。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鉴于人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在电子产品使用上，智库应该顺应潮流，利用社交媒体去触及更多的大众人群，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网站平台。未来智库应更广泛地在网络上发表研究报告，并利用数字媒体的技术来展示研究成果。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汇集东西方文化，是中国连接世界的窗口。希望在未来能充分地发挥智库作用，实现使命和愿景，让世界更和谐。（团结香港基金政策倡议及推动高级经理毛玲凤）

# 国际化智库和智库国际化

全球化正拉动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发展，而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也在不断促进全球化的深入。近年来，中国众多智库正面临向国际化智库转型的趋势，同时也在寻求不同的方式与国际接轨。中国智库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智库走向世界，更好为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建言献策的必经之路。在此背景下，本场分论坛以“国际化智库和智库国际化——路径和挑战”为主题，聚集中外智库专家，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出发，深度剖析中国智库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面对的机遇与挑战，为中国智库如何实现国际化提供对策与建议。



**中国智库坚持做一件事情，走一条路子，担一份责任**  
谈及全球化，中美关系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何况现在中美关系对全球化某种程度上是有着决定性的

影响。要明白这点，我认为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美国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又如何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我来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讨论，中国是不是新型开放的大国。我认为这要考虑三个重要的方面：一、中国的全球观；二、中国的发展观；三、中国的改革观。中国这些年坚持多边贸易、全球治理、积极改革开放，这些政策的方向都是对的，它是一个新型开放大国。我们的研究院是中国的智库，这些年来我们就做三点：坚持做一件事，改革研究。坚持走一条路，用改革的做法办事，要做到网络化、国际化、独立性。坚持一份责任，把改革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智库国际化考虑新的合作和宣传方式，充分利用最先进的技术

技术的发展给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带来了许多机会，我们需要把握机会进行合作。我们要变得更加国际化，所有的智库都应该考虑到，我们可以更多地采用网上会议这种形式进行合作。我们有技术，有聊天软件而且我们的翻译也非常出色。现在的语音识别技术，语音翻译技术也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考虑那种数字化的，或者说是音频的传播方式，也可以通过订阅的方式扩大影响。另外，在成果出版方面，由于书面材料出版的成本抬高，智库也可以考虑采用像电子书这

## 智库发展应更注重多元化

多样性对于智库这样的机构发展十分重要。正如麦甘博士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改变的时代，这些改变让未来也更加难以预测。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智库在进行政策研究时更加需要来自不同群体的声音，注重意见的多元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就是应将多元化这一思想贯穿始终。在当下国际形势变化加剧，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智库研究注重观点多元化有利于决策者避免做出极端决定，从而推动国际多边合作发展。（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 Tim Summers）

“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由全球化智库（CCG）发起，旨在关注全球智库行业在发展与创新领域新趋势，促进全球智库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间的交流合作，以更好地承担当代智库的历史使命。作为在中国举办的全球智库论坛，“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至2019年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全球数十个国家、国际组织，上百家智库，数百名海内外战略、经济、商业领域的研究机构和团体代表参与了往届活动。“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已形成国际会议品牌，就智库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展开思想碰撞，凝聚全球智库共识，积极探求前瞻性、创新性的解决方案。（2019-06-04 CCG）

样的形式去减少成本，也能扩大传播。虽然利用在线的工具并不能一定取得成功，因为它必须是一个综合性的传播方案和战略，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但是这肯定是一个起点。（CCG高级研究员Harvey Dzodin）

**中国智库“走出去”需要有敢于辩论的担当，澄清事实理性讨论**

智库的国际化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国际化的建设过程中，智库能够发挥作用，包括交流本国之间的政策、理念、观点，同时也可以向国际组织、国际社会提供一些方案。当前我们也遇到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包括前面谈到的新型大国问题、“一带一路”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智库出谋划策。中国智库要想走出去，必然要面对很多挑战，比如我们中国智库如何面对其他智库的不同观点？这些智库的观点如何能够更符合事实？我们如何能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大多数人？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中国智库需要有担当，敢于辩论，澄清事实，多提供一些理性化的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前副所长、研究员李国强）

**中美贸易战将会过渡到科技战，中美智库应该积极推动双边对话**

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西方主导的世界差别较大，加之中国的实力、影响力近年来得到全面提升，这就让世界对于中国的感知越来越强烈。我们的体会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当中，相互了解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展开多样化的讨论。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所持有的态度必须十分谨慎，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目前中美贸易冲突应该从关税战过渡到科技战，未来有可能蔓延到其他领域。要化解当前危机，我认为关键是要去政治化，不要把一些技术的问题、贸易的问题上升到地缘政治的高度。同时我希望中美智库推动两国政府、两国的领导人尽早开展对话，把当前的危机转变成为一个深化中美战略上互信、经济上互利关系的契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

**全球化的智库应该尽量避免立场，着重解释立场背后的逻辑**

我们今天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能会有波折，但是我们更加能够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智库应该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因为智库不是简单地解释这些政策，当然解释政策很重要，但是智库更多的应该反映这些政策制定者背后的制定政策的逻辑，怎么帮助他们制定有效的、能够真正给全球贸易增长、给各个国家带来福利的好的

政策。好的政策就要基于我们有效的研究，有效地去揭示这些真正的全球商业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和背后的本质。不能说我们很乐观，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地球越来越小，全球化是每个人不能回避的，每个企业不能回避的，当然，每个政府也不能回避的。全球化的智库在发表言论、做研究的时候，应该较少关注立场，更多的是揭示这些立场背后的这些逻辑。而这些实践也涉及到智库的转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王健）

**用全球的语言，讨论全球的问题，形成全球治理的体系**

我认为很多中国智库从硬件上来说它的国际化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可能在软件上，比如人员的国际化、研究合作的国际化网络构建、成果国际化的发表、分享都有很多不足。一些中国高端智库的网站上，他们中文的研究成果是很丰富的，但是翻译成英语的，甚至是其他语言的研究成果却很少。这是我认为当前中国智库国际化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也是比较好解决的问题。除了语言，我还认为中国智库的研究方向应该不仅仅局限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应该拓展到全球性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共享的全球观。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共同的地球家园，如何构建大家认可的全球观和全球治理的体系，这是我们智库面临的大的课题。（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主任于运全）

**中国智库应该提供国内和国际的多元化声音**

如今中美的经贸摩擦升级，中国在国际上也有一些误解没有及时得到澄清。一方面，这需要我们给决策者提供多元的声音，同时也需要给国际社会提供中国的多样的声音，这也是中国国际化智库需要做的。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因为国内国际现在是一盘棋，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都应该要预判国际社会对这些政策的看法，既要考虑到对方的反应和更要拿出我方相应的对策，并能够在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考虑这些因素。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中国智库国际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今天的话题是国际化智库的挑战和路径，其实很大程度上，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不是邀请国际嘉宾来交流，或者中国智库走出去参加活动，而是在于一方面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的政策即“中国政策的国际叙事”，另一方面，国际化智库如何用国际视野反过来影响中国决策的多元化和国际化，这是一种双向沟通和推动。（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

（2019-06-05 全球化智库）

# 信息化时代如何提升 智库管理和人才培育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的崛起，新的工业革命浪潮再次呼啸而来——此刻的信息革命不仅仅正在取代劳动者的双手，同时也在推动生产方式的更新换代。智库发展环境在不断变化，这意味着智库也需要不断地调整管理和人才培育策略。在此背景下，本场分论坛以“智库管理能力和智库人才培育体系的创新发展”为主题，聚集全球顶尖智库专家，围绕目前智库的发展目标和需求进行深入探讨交流，为智库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管理制度和人才培育体系提出许多可行性建议。

## 每个国家的智库有每个国家的特色

阿登纳基金会本身隶属于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政党，旨在促进德国、欧洲和世界的自由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加强价值观的一致性。每个国家的智库有每个国家的特色，德国没有国有智库，但包括我们在内的智库仍然关注外交和安全领域政策，同时也会为政府提供一些信息。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智库，但同时承担着智库的职能，它致力于政策研究和对话，也在国际合作

领域有所作为。和传统智库的组织结构不太一样，我们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包括拉丁美洲、亚太地区、中东和北美洲等区域，其职能管理机制复杂，类似于国家的外交部门。由于各区域各领域情况不同，阿登纳基金会对项目代表的管理要求很高，他们需要了解该区域的总体趋势和国情，并与当地政党保持合作和沟通。（德国阿登纳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 Alexander Badenheim）

## 初创智库既要做到“自上而下”也要“自下而上”

海国图智规模不大，但充满活力。智库是没有学生的大学，智库是没有利润的思想工程，但是智库仍然需要平衡其投入和产出，同时为社会创造价值。作为初创智库，我们要搞清楚“受众是谁”和“我们是谁”这两个问题，既要做到“自上而下”也要“自下而上”。社会智库是目前中国发展阶段的典型产物，它们规模相对较小、资源稀缺、部分远离政治中心，但模式灵活。社会智库应在改革大背景下加强对非传统议题的参与度，

在新领域采取新方法，实现差异化发展，发挥自身优势。一方面，智库需要学者的研究和成果来完成服务社会和高校这一基本职能；另一方面，智库应该引导学者填补相关空白领域的研究，扩大知识传播。（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鹿琦）

#### 智库要实现向人才“赋权”

团结香港基金关注公共政策研究和中国研究，同时鼓励创新精神，我们的社会组织平台拥有 120 个 CEO，目的是为香港社会带来更多价值。目前智库发展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管理人力资源难，第二个是留人难。智库需要远大的愿景，人才需要十分的热情。智库应该要向员工和研究者进行“赋权”，给他们上升机会，包括提供国内国际会议参加机会，向大学生保持求职渠道的畅通。从组织管理角度来看，为了赶上快速变化的世界，组织管理机制需要灵活性。人才管理是长期的，应该向全球同行学习，培养人才不仅仅是依靠人才本身，还要有领导精神。国内外智库都应保持紧密的合作，智库要搭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鼓励多元化参与。（团结香港基金政策倡议及推动高级经理毛玲凤）

#### 智库要明确自身存在的意义

如何打造成功的智库可以从以下三点进行思考。第一，智库需要知道自身的存在意义。兰德公司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自始至终都关注自己的原则所在，它勇于对权力说出真相。和咨询公司相似，智库提供服务产品，研究者生产新的知识，而专家带来新的思想。第二，结果取决于衡量标准。包括智库在内的不少组织普遍存在着想法很多，但理解践行存在困难的尴尬。对于组织领导者而言，需要明确组织发展的目标，是出版多少刊物？是举办多少活动？或是其他？第三，没有必要“另辟蹊径”。对于组织来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借鉴其他组织的前车之鉴，与同行进行互动。在特定领域的经验分享可以通过讲座开设、数据共享或是案例研究来促进组织困境的缓解。

国内外智库的不同主要在于三方面：第一，结构不同。由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两党制，因此智库的功能之一就是“旋转门”。第二，发展程度不同。美国智库

国际化进程快，机构成熟度高；中国智库随着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而提升，在改革开放环境中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智库品牌。第三，衡量标准不同。考虑到物理、心理空间的限制，智库就面临的挑战需要构建不同的框架和环境，并围绕这一框架展开工作。（CCG 高级咨询师、CGTN 科技与地缘政治评论员 Andy Mok（莫天安））

#### 智库需要多学科和多层次的人才

朱镕基要求青年学子“学贯中西、精通文理、学以致用”。对于智库来说也是一样的，智库人才不仅要了解世界局势，还要通晓文理专业知识。智库像一个水库，融汇多学科和多层次的人才。智库培养管理能力，最缺的是领导者。中国国内智库总数已近超过 500 家，“量”已够但“质”不行，目前需要的是高质量人才支撑。出色的研究团队中需要的人才，是能在不同领域有能力深入研究的人才，他们不仅能生产新的知识，还要有能力深入调查、了解实际情况。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智库发挥学术、政策和社会影响力的使命是一样的，应互相交流。苏世民书院每年有 15% 的毕业生选择了分布在北京、香港和华盛顿的智库，我们的目的就是更好地给智库输送人才，能够搭一个平台，从数字上来说，我们的方向目前看还是可以的。人才培养是长期的，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校不能为智库量身打造相关人才，但目前严峻的就业环境也向智库提供了不少机会。（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执行院长潘庆中）

#### 没有高端的人才就没有高端的智库

人才是 21 世纪的第一竞争力，没有高端的人才就没有高端的智库。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智库间存在差异，但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智库既需要研究知识型人才，又需要管理型人才。吸引高水平研究型人才必须要具备相匹配的组织环境、高效的管理体系和强大的资金支持；而这些工作又需要高水平智库管理人才来实现。需要在座同仁在今后的观察和工作中，继续摸索并进行更高层次的思考，这对于智库提高组织运营管理能力和完善人才运用策略无疑是有意义的。（CCG 副秘书长唐蓓洁）

（2019-06-05 CCG）



# 中美贸易摩擦下， 两国智库的角色及合作

当下，大国间在经贸、政治，乃至科技、文化、人才等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在传统的政府间官方外交往来之外，社会各界正寻求以新的方式改进国家间关系。不同国家间拥有政策影响力的智库的相互合作，对国家关系的改善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此，本场分论坛特别以“大国竞争背景下的智库创新合作”为主题，国内外智库专家重点讨论了当下大国竞争呈现的新特点，智库如何通过合作改进国家间关系以及不同国家、地区智库可采取哪些创新性的合作方式，为大国竞争中智库的合作与创新提出了真知灼见。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经济自由度指数编辑兼研究主管 Anthony Kim 指出：中美加强交流对促进实实在在的接触有正面作用。一，智库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些想法，找到一些共同的解决方案，这样可以给问题解决的流程加入更多想法和选择。二，智库最大的财产是其研究人员，人员是最基本单位，因为对智库来说人员就是政策的来源，所以加强智库间的人员交流至关重要。三，中美两国现在也在加强这方面的交流，

这对促进中美关系之间的接触转成实实在在的接触具有很大的正面作用。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苏浩指出：西方应多了解东方对权力的解释及看法。虽然中美智库间的交流非常频繁，但仍对扭转中美关系走向恶化没有起到明显的积极效应。原因一，从战略层面来看，中美关系恶化是因美方战略取向发生了变化，因而导致其在政策制定及外交政策上发生了改变。二是因为西方国家仍秉持着西方的思维模式，即以“权力转移”模式来处理中美关系。西方应多了解东方对权力的解释及看法，允许大国间和平共处，这样中美才会有新的观念来认知对方。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亚琴指出：两国智库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上可有更多作为，当前大国竞争日益加剧，这对智库的创新合作意味着什么？一，随着中美间竞争日益加剧，智库间的合作交流可能会受到限制，智库也会受到政界、社会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压制及冲击。但两国智库在一些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上可以有更多作为及发展空间。二，智库的一个目的在于推动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可借助国际组织等第三方机构达到这一目的，促进政界、学界以及产业界之间的交流和推动进一步合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朱旭峰指出：智库要参与到大国道路之争，需要抛弃几个迷思：智库要参与到大国道路之争，首先要想明白自身定位，要抛弃原来被美国学者所定义的智库的价值，需要抛弃几个迷思：一，中国应对智库价值作出自己的理解，不能一味跟着西方认为的“只有民主才是智库赖以生存的土壤”。二，由于美国是两党轮替，退休官员没有工作，美国的智库

（下接第 20 页）

# 高质量发展 视域下的智库创新

在中国智库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共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智库建设过度关注人才队伍建设，忽视了智库的组织行为作用。致使智库专家共享程度居高不下，一些智库专家没能在咨政建言、对策研究、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智库创新不仅可以消解智库专家共享带来的问题，还能够推动智库向高质量智库发展。



智库专家共享过犹不及

智库建设离不开人才队伍建设，智库专家共享是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智库人才队伍建设是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智慧，为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提供可行或最优方案。无论智库人才选拔机制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竞争的，对智库专家的要求总是有条件的，既要有知名学者、专家、企业界精英、政府卸任官员这样的身份背景，也要熟知国情、世情、党情、社情、民情、舆情，还要了

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扎实功底，能借鉴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理论，善于预见问题、发现问题、应对问题、解决问题和防范问题等。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智库专家少之又少，智库专家资源非常有限，由于不同的智库需要相同的专家，智库专家共享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越是知名的学者、专家、企业界精英、政府卸任官员，在不同的智库中共享程度就越高，共享程度与智库专家的知名度成正比。智库专家的共享带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在智库决策中知名的智库专家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智库专家是本领域的精英，并不缺少建言献策的渠道。尽管不同智库从不同的领域提出不同的问题，由于智库专家的偏好和局限性，势必带来决策结果的雷同，倘若智库将智库专家的建议直接提供给决策者，就会导致智库特色的消失，使智库失去生命力。智库的类型本来是丰富多彩的，具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机构属性，既可以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共研究机构，也可以是不具有政府背景或具有准政府背景的私营研究机构；既可以是营利性研究机构，也可以是非营利性研究机构，这注定了不同的智库有不同的目标。而智库专家过度共享导致的问题是，智库很难拿出有针对性、有分量、有依据、有理论、有对策、有评判、有分析、有前瞻性的成果和可操作的对策建议，这是关乎到中国智库能否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

## 发挥智库的组织行为作用

智库建设不仅是人才队伍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发挥智库的组织行为作用。智库的组织行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

当下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原因是忽略了智库



的组织行为作用。在实现智库的组织行为作用方面，需要认识到的是，智库专家提供的方案，仅仅是可供决策的参谋性建议，而不是决策本身。智库最后的决策性建议可能是多个智库专家提供的方案综合，也可能完全不同于这些方案。智库中旋转门式的人才要对智库专家的方案做出研判，出于对决策后果负责任的原则做出最后的选择。由此可见，高质量智库必须充分发挥智库的组织行为作用。

智库的组织行为作用远远超越了智库专家提供的方案总和，它是在智库专家提供方案基础上做出的更高级的决策，可以规避智库专家共享带来的问题。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智库没有对智库专家的方案进行研判和分析，而是将智库专家的方案直接作为决策的建议提供给相关部门，其后果是不符合实际或不具有可操作性。智库的组织行为建立在智库专家方案的基础上，不完全依赖于智库专家，只有充分发挥智库的组织行为作用，才能消解智库专家共享带来的问题，使得智库向高质量发展。智库是开放组织，同智库专家密切相关。但是，智库专家建议是从特定角度提出的，不仅难以对建议后果有效承担责任，也不对维护智库特色负责。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有些智库成立之初具有鲜明特色，由于没有能力发挥智库的组织行为作用，智库也就变成了智库专家推送建议的平台。久而久之，这样的智库不仅特色消失，不适应实际需求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智库的组织行为作用总是围绕智库特色和具体的问题展开，这是构建在智库专家提供的方案基础上的决策，也是负责任的决策，还是高质量的决策，只有高质量决策才能撑得起高质量的智库。

#### 旋转门式智库人才举足轻重

智库具有永存的创新属性，智库创新始终在三个维度上进行，即人才队伍建设的创新、智库的组织行为作用的创新和旋转门式的人才创新。中国智库正处于向高质量智库发展的阶段，这是提升质量和效益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在智库创新过程中形成鲜明的发展特色，与此同时将智库做专、做深、做实、做优、做强，凸显智库

功能，不断提升智库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智库创新既要以智库专家为中心，也要以任务为中心，既有权力轴线，也有责任轴线。从人才队伍建设创新维度看，新型智库组织与传统其他组织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新型智库组织是开放型的组织，智库专家可以不具有行政岗位设置和行政编制，不受行政编制限制，智库完全根据具体情况聘用智库专家，新型智库专家人才队伍建设的去行政化，决定了智库人才队伍建设的自我创新。从智库组织行为作用的创新维度看，智库是被创造出来的组织，借助智库专家的集体行为完成任务，并根据社会需要而不断的变化，智库的组织行为作用推动着智库创新，且具有鲜明的创新定位和特色化的研究方向。从旋转门式的人才创新维度看，智库创新不是自发演变的结果，自发演变过程中会产生混乱、摩擦和不良绩效，智库创新必须预先设定目标，这是智库组织行为是否能够高效运转和取得良好绩效的先决条件，也是智库的组织行为在软层面的基本形态。

预先设定目标的决策者是智库中旋转门式的人才，预先设定的目标决定智库的组织行为，智库的组织行为作用是实现各种目标的手段，为保证效率和合理性，必须使智库的组织行为的作用与预先设定目标相适应。由此可见，虽然智库通过组织行为发挥效率，但是，智库预先设定的目标构建在智库的组织行为之上，亦即必须有旋转门式的人才参与决策。智库创新不仅需要旋转门式的人才，还要培养旋转门式的人才。

综上所述，智库人才队伍建设是基础，智库组织行为作用是关键，旋转门式人才在智库创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旋转门式人才的前瞻性、预见性和预测性凭借的是头脑中的“大数据”。在信息社会，信息传递的结构正在从下至上到从上至下的进行，社会管理正在向社会治理转变，决策的前瞻性、预见性和预测性至关重要，通过大数据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当的客观性，智库创新离不开发挥旋转门式人才的作用。

(2019-05-09 中国社会科学网)



# 全球治理与中国视野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时代之问，是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未来的重大命题。在处于大变局中的当今世界，更是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思考、聚力推动的首要议程。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从哪里来向哪里去？面临什么机遇和挑战？中国如何看待和参与全球治理？我有以下三方面的思考。



## 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发展

国家主义主导的国际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演绎有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虽然关于世界的人类理想渊源久远，但国际治理思想还是应该追溯到“国际法之父”格劳修斯，他提出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律约束国家间关系，对形成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以及以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法为基础的第一个国际治理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启国际法律治理的先河。

第二个里程碑，是以《国际联盟盟约》为核心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虽然由于过于理想化导致举步维艰，但国际联盟作为以多边协商取代单边霸权的积极探索，作为用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维护世界秩序的重要尝试，开启了国际政治安全治理的先河。前两个国际治理体系，都是在世界“支离破碎”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都是作为战争产物以战后安排为主建立的，也都是以欧美为中心把世界多数国家排除在外的。因此，只能算是国际治理体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治理体系。

第三个里程碑，是1945年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包括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集体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安全体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后称世贸组织）以及后来瓦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构成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由国际司法机构和国际法及国际规则等构成的国际法律体系等。雅尔塔体系为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国际秩序支撑，其制度框架延续至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仍然是国际社会成员的基本行为准则。然而由于雅尔塔体系建立后不久，冷战风云就笼罩了世界，出现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局面，形成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分而治之的两极格局，在近半个世纪里，沦为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政治平台。

至于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发展，有三个标志性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全球治理理念的提出。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非战争方式坍塌，国际体系进入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转型调整时期。1990年德国前总理勃朗特前瞻性地提出，各国要适应国际体系新走向，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国际知名人士于1992年发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并于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天涯若比邻》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涵义和理念，提出全球安全与治理倡议。应该说，这顺应了当时的世界发展潮流，即冷战结束打破了全球分割分裂局面，需要把世界作为整体加以规范和管理，开启当代全球治理理念的先河。第二个事件，是八国集团的组成。1997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七国集团吸纳俄罗斯参与，试图以冷战后的“大国合作”模式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使之成为“美国治下”、西方主导的全

球治理主要机制。但由于缺乏包容性、代表性和影响力，七国集团也好，八国集团也罢，都沦为坐而论道的“大国俱乐部”。

第三个事件，是二十国集团的设立。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出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新问题，冷战后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原有全球治理体系缺陷和弊端暴露无遗。由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等额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应运而生，在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改革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

近10年来，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人类共同挑战，在国际、区域和一系列重要议程上，推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及其机制改革取得一些成效。建立起全球经济治理新架构，扩大了联合国发展议程，推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的改革，签署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东盟、欧盟、非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组织加强区域综合治理，相关方自愿组合对话解决伊核等热点问题，金砖国家成为新兴大国和南南合作新平台。凡此种种，都顺应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在全球治理参与权、国际规则制定权、多边议题话语权、发展利益分享权等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和人类共同挑战更多关切，推动全球治理从两极争霸、西方主导向南北共治方向演进。

#### 全球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核心内容和未来走向，都与全球治理密切相关。

一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继以蒸汽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以电力技术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以信息技术、网络通讯、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集群式发展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呈现出机械化与智能化、信息化和绿色经济融合发展趋势，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着国力提升方式、国际竞争内涵和传统战争形态，引发经济、社会 and 军事力量革命性增长，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对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等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是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牵引下，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加速整合融合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统一大市场自由流动并优化配置，各国互联互通、相互依存、利益交融的“地球村”逐步生成，

全球经济社会均衡稳定、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各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亟待协调平衡。

三是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原有大国继续保持优势地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总体朝南北均衡方向发展。区域跨区域合作机制叠加，国际和地区组织更加活跃，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网络媒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影响扩大，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加多样。国际机制需要适应新兴力量上升态势，国际权力必然出现分散化趋势，少数国家主宰世界、多数国家被排除在外的局面难以为继。

四是全球性挑战更加多样。世界整体性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使国际社会面临更多共同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对全球治理有重大而紧迫的需求。经济危机、地缘冲突、恐怖主义、生态恶化、难民涌动、跨国犯罪、公共卫生以及网络、能源、粮食安全等威胁挑战，都不是靠强国之力或独善其身可以解决的，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加以应对，维护人类和平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时代、多极化世界、信息化社会面貌显露，国家主义至上的狭隘性以及原有全球治理机制的代表性、适应性和有效性显然落后于时代，加强全球治理和改革治理体系势在必行。以二十国集团诞生为起点，国际社会在全球和地区组织平台上，通过紧密型或松散型合作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欧洲、东亚等地区治理取得一些成功经验，卫生防疫、救灾缉毒、航空海运、边界管控等领域治理成效显著，形成多元多样的地区和领域治理模式及平台机制。但总的来看，全球治理受到霸权强权羁绊，治理体系存在缺陷，各国地位极不平等，价值利益差异较大，权力和责任严重失衡，治理主体权威不够，治理能力亟待提升，在很多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和合力。

特别是美国认为自己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透支了、受损了，让其他国家“搭了便车”“占了便宜”，以特立独行替代认为“吃亏”的国际规则，用“退群”举动冲击主导建立的制度体系，急于摆脱无利可图的治理义务，两年创下退出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的历史纪录。例如：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议定书，大幅削减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助机构、反恐机制等资助，严重影响联合国有效运转，造成部分机构瘫痪。面对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压力倍增，二十国集团功能和影响下降，全球经济治理均衡化和民主化趋势停滞。特别是美国停

止履行《中导条约》、宣布退出《武器贸易条约》、不再公布核武器数量、可能恢复使用低当量核武器等举动，撼动维系全球和大国战略稳定的军控及核裁军体系，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美国的质疑和冲撞，恶化了国际合作氛围，加剧了全球治理的机制缺失、动力减弱、效能降低，出现失能失序状态。

面对全球治理的时代之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理念。一种是霸权主导的全球治理理念。以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以强权政治为特征，通过垄断资本和国际机制在世界范围推而广之，为西方“治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提供基础性支撑，也长期成为重要国际组织和多数国家的思维定势和政策取向。而近年来欧美地区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现实主义结合的产物，崇尚国家中心主义和本国利益至上，是对全球化背离其初衷的强烈反弹。

另一种是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新理念。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模式和“华盛顿共识”受到严重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三大学派在国际形势变化面前失灵。引发各国政界和思想界的集体反思，到底什么样的制度模式、什么样的国际关系、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更适应全球化时代？我们看到，超越传统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概念被普遍使用，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陆续推出。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创建全球社会”“创立全球国际关系学”“管理全球公域”等其他全球治理主张也先后出现。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年会以“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为主题，也传递出全球治理和秩序重建的清晰信号。全球治理新理念新探索的基本前提和总体思路，是对世界大变局的感悟，是对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认同，是对“地球村”和世界整体性发展的关注，是对人类基本伦理和理性法则的坚守，是对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远见，是对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思考。一句话，是以世界主义情怀超越国家主义观念的追求。这些全球治理新共识和共同价值，是在各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实践中积累的，是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比较借鉴中形成的，更是在总体把握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

在全球化时代，是笃信动物世界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还是寻求人类社会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共赢。这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不同的选择将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上述两类全球治理理念的根本差异在于，在全球化

时代，是笃信动物世界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还是寻求人类社会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共赢。这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不同的选择将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 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

中国文化的世界理念古而有之，“以天下观天下”而非“以国观天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和谐世界”等中国的“天下观”，表达了中国人对世界理想主义的美好期待。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则经历了从隔绝到开放、从怀疑到参与、从被动到主动、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后，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融入国际体系和全球化的进程。2008年参与创建二十国集团机制，标志着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体系建设。近几年来，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密集提出一系列全球治理理念主张，在各领域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中创新探索，针对“谁来治理”“怎样治理”“为什么治理”和治理目标等基本问题，形成有鲜明中国印记的全球治理思想与实践成果。这是中国进入由大向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拓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概括起来有几个方面。

第一，在继承和发展中创新全球治理理念。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主张，来源于中华文化积淀、新中国外交思想、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国际社会的积极探索与时代呼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基本前提是，做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与各国携手合作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的多边主义，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维护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在与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中，携手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建设。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当今世界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

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总体目标是，推动形成以共同利益和共同安全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力图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分野，以“人类中心主义”冲破世界发展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商”

强调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协商合作，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共建”意味着在普遍参与的基础上，形成开放包容的合作机制，探索灵活务实的治理模式。“共享”注重互利共赢，各国能够普遍受益，实现公平、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全球相互依存条件下各方实现共存共赢的唯一路径。

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平等、公平正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强调全球治理应该主体多元、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治理体系要有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尤其要让长期受到排斥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获得与其地位和影响相符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这是对丛林法则、零和思维、强权政治的根本否定。

第二，顺势而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中国坚持立足现实、问题导向、目标引领，已经形成广泛共识、能够做的事情，与国际社会一道先做起来，循序渐进加以推动，促进提高全球治理效能。中国参与推进联合国系统相关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机制改革，推动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代表性和发言权。发起建立发展中国家参与或主导的全球治理合作平台，努力补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南方缺位。推动二十国集团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化，巩固并发挥好这个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作用。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包括设立金砖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将其打造成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支持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非盟、阿盟等积极作用，推动加强亚信峰会、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机制建设，扩大地区自由贸易安排布局。积极参与制定网络、海洋、极地、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并身体力行。

第三，履行大国责任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为促进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挑战，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二十国集团

杭州峰会、亚洲文明对话等，力求取得开创性、引导性、机制性成果。增加联合国会费，实施国际发展援助，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力度。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推动完善亚洲金融合作机制，促进亚洲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实践舞台，以共商共建共享方式和互联互通互融途径，开创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新模式，迄今吸引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区域合作平台、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机制、新动力。

第四，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安全领域，坚持劝和促谈，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促成伊朗核问题六方协定，推动叙利亚、南苏丹、阿富汗、缅甸等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合作，派军舰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在发展领域，宣布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推动各方达成并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在国内大力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推动制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率先发布国别落实方案，积极促进全球范围内经济平衡发展。在社会领域，积极参与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发起并主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积极开展国际反腐败合作，推动构建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

尽管全球治理从理念到实践、从平台到机制，都远远跟不上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积极探索，对于改革建设转型变化中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各国各界在世界乱局变局中，多出睿智的思想，多发理性的声音，多做有益的贡献，为我们共同的世界争取美好的未来。

（2019年19期 中国新闻周刊）



# 中国是发达国家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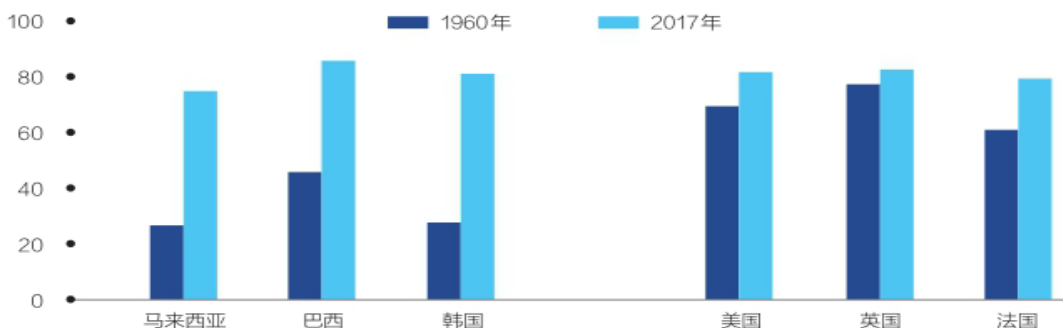
当前西方国家就中国经济的性质判断存在两个主要争论——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体和中国是否还是发展中国家。毋庸讳言，在观点争论的水面之下有着利益的博弈：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能保持对中国的贸易歧视，否认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能减少中国的权利。

从国际比较看，马来西亚一般被认定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根据 IMF 的官方数据，马来西亚 2018 年人均 GDP 为 10941.75 美元，而中国大陆 2018 年的人均

GDP 只有 9608.42 美元，显然把中国纳入发达国家类别并不合理。拿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做文章，本质上是西方国家的“传统”政治手段。

上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国身份的谈判期间，美国就用购买力平价法测算出中国 1994 年人均 GDP 达到 4000 美元，声称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并以能够发射卫星、拥有现代化的城市北京和在申办奥运会中为例证，阻碍了中国“复关”。

图：典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城市化率对比（1960 年和 2017 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基础建设、航天、通讯、互联网、国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了最大规模的中产人群，培育出庞大的消费市场，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否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声音再次响起。

2018 年 10 月，日本停止了对华长达 39 年的 ODA 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卡普兰（Gilbert Kaplan）为代表的西方政客，曾在多个场合声称中国应该被列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特朗普甚至还令人诧异地声称“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只是比别人发展得快了点”，

试图进一步混淆界线。

## 何为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的概念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非常明显。直观上看，发达国家是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西方国家集合；发展中国家是未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前殖民地国家集合。历史维度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人们对发展中国的概念界定，例如韩国经济水平虽然已经超过了不少西方国家，但我们一般不认为韩国是发达国家，而认为韩国是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

目前，准确的发展中国标准并不存在，国际上通行的国家分类主要是用列举法。20 世纪 60 年代，联合

国首次使用了发达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市场经济体和中央计划经济体的分类；在《统计年鉴（1990/1991年）》中，首次出现了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分类，明确了通常公认的发达地区是指欧洲、前苏联、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展中地区则为世界其他地区，但同时指出，国际标准并不存在；此后较大一次变动体现在联合国统计司的《地区和国家分类标准（2013年10月31日修订版）》把以色列、南非等少数国家调整为发达国家，把南斯拉夫调整为发展中国家，将前苏联以及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地区单列，既不属于发达经济体，也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

其他重要国际组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范畴界定也存在不清晰、不准确、不固定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操作层面和分析层面对国家分类提出了多个平行的标准，并在1997年以后用“先进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代替了“发达国家”的称谓，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代替了“发展中国家”的称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上现列先进经济体共有39个，除了欧元区国家和G7国家之外，还包括了捷克、丹麦、冰岛、挪威、瑞典、瑞士、以色列、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波多黎各等国家和地区。其余则被列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世界银行从1978年开始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以人均国民收入为标准，把国家划分为低收入（low income）、中等收入（middle income）和高收入（high income）三大类别，1989年中等收入再次划分为中等偏下（lower middle income）和中等偏上（upper middle income）两个类别。这一标准每年仅依据通货膨胀率调整，而没有反映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水平的巨大飞跃，致使超过高收入基准的国家数量已经超过80个，贫困国家只有31个左右，大量国家堆积在中等收入阶段。

从统计意义看，当前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门槛并非21世纪发达国家的门槛，而是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门槛，因此世行的“毕业”标准并不意味着成为发达国家，一些早已稳定地超过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沙特、智利、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一般并不被国际公认为发达经济体。而且仅达到高收入的国家经济表现并不像原有发达国家那样稳健，在中等收入国家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的居民数量远远大于低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中等收入国家很难突破高收入基准线，形成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 经济学意义上的标准

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本质经济特征。“二元经济”结构论的开拓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可以分为两大部门：城市中的制造业和农村中的农业、手工业等传统产业，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城市化率上。

但这一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传统产业被西方高效率、高补贴的农业产品自由贸易冲垮，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发展中国家的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形成蔚为可观的贫民窟；一些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率与发达国家已经不相上下，从前那种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高，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低的非常直观的“二元经济”差异消失不见了。

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工业化水平也不能再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标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WTO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市场制度已经在全球普及；发展中国家在战后70多年里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工业化，部分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在少数新兴产业领域与传统强国并驾齐驱，而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后工业时代。美国、澳大利亚等富裕的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基础原材料和农产品占了很大比例，连印象中资源匮乏的日本在2018年对中国就出口了9.48亿元人民币的木材，约占日本全年木材出口额的45%。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形成，但并非对等关系，如果考虑利益分配，发达国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繁忙却不富裕。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一是相对人均收入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或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依然是最直接、最明显的指标，但科技在发展，生产力水平在提升，应当以反映时代的相对人均收入水平做有效参照。

二是人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能体现财富的分配是否相对均衡，也不能反映社会和政治秩序状况。在很多中等收入国家，过度的贫富悬殊引发尖锐的社会对立，继而导致政治的民粹主义泛滥，使得发展的成果无法惠及广泛的人民群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发布的《人文发展报告》从另一个角度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认定带来启示和参考，依据人类发展指数（HDI）将各国划分为高人文发展水平（占

全部经济体总数的 25%)、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和低人文发展水平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分组阈值每年均会进行动态调整。

三是经济增长方式。保罗·克鲁格曼在上世纪 90 年代针对所谓“亚洲经济奇迹”，指出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无法持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进一步解释了国与国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建立在内生的技术进步基础之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靠拢的最主要途径。众多发展中资源输出国的人均收入相对较高，但并不会被纳入发达国家；而那些依靠粗放投入、环境污染、非熟练工人的发展中国家无法从根本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 准确定位中国的发展阶段

中国苦难的近代史决定了中国不会是原本意义上的发达国家。中国的发展成就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极大的激励，中国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中国也要客观看待自己的真实发展阶段还远远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首先，中国去年人均 GDP 为 9608 美元，距离全球平均水平的 11350 美元还有一段距离，低于世界银行高收入门槛，仅为美国人均 GDP 的 15%。其次，在 2018 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中，中国为 0.752 排名第 86 位，仅处于中等水平。联合国把 HDI 指数 0.8 以上的国家划分为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中国的 HDI 指数表明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还有较大差距。第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具有显著的发展中国家特点。一是要素投入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项基于 30 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特征并没有改变，甚至在加强；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伴随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国经济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即便如此，中国的投资仍然还有较大的空间，例如 2015 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为 12.1 万公里，远远低于美国的 22.8 万公里，这还是美国淘汰了很多铁路的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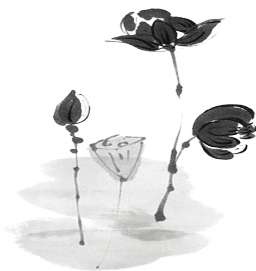
果，所以中长期内中国的投资拉动模式并不会被改变。中国当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状态没有改变。

“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不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这一说法的逻辑是以中国取得的少数经济成就代替整体水平，用大经济体特点代替发达国家标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指水平，而不是规模。印度 2018 年的经济总量约等于澳大利亚、瑞士、瑞典三国经济规模之和，显然不能就此认为印度的发展水平高于三国中其中任意一国。改革开放 40 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这些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无法掩盖的是中国整体发展水平还很低，东西部差距明显。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还很欠缺。在列举中国的一些成就的同时，有意掩盖了在整体上和更多领域里中国还很落后的现实。

关于中国的某些突出成就，比如高铁、航天、繁荣的一线城市、国际贸易甚至军事等成绩以及国际影响力其实是大经济体的特点，而不是发达国家的标志。目前中国取得优势的领域，一般都与中国规模有关。例如，德国、日本、法国比中国早几十年就有高铁技术了，但这些国家领土面积和人口达不到发展高铁所需的最低规模，就无法发展高铁技术。经济规模大的经济体可以承担更大的成本，比如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已有（过）三艘航母，并有一艘在建，虽然航母运营成本高昂，但相对于印度庞大的经济规模，仍然可以负担，瑞士、瑞典再发达，经济总量小就无法维持航母。中国科技水平提升迅速的背景是中国大陆的研发投入只占 GDP 的 2.18%，低于以色列、韩国、日本、德国、美国，但科研经费总规模却达到 1.96 万亿元人民币，再加上每年 700 万的大学毕业生增量人力资本，所以中国科技水平虽然不高，但追赶速度惊人。

规模意味着影响力，美国外贸总额只占美国 GDP 的 11% 左右，但美国却是众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对这些贸易伙伴极为重要，而单个贸易伙伴对美国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同理，大国在地缘政治上都具有先天优势，这和是不是发达国家没有关系。

(2019 年 13 期 财经)





# 关于中国 5G 牌照的深度研判

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正式颁发 5G 牌照，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我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一石激起千层浪，相较于此前各运营商官方表述的“2020 年 5G 正式商用”时间表，工信部将 5G 牌照的发放时间至少提前了半年。那么，5G 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试着参考 4G 市场发展的相关历史数据，做一个全面的分析。

## 通信运营商：扛起更多责任

5G 牌照的发放对象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这三大传统通信运营商和新入局的中国广电。拿到 5G 牌照后，三大运营商获得了在此前已经授予的 5G 试验频谱上正式开始 5G 网络建设和 5G 业务运营的资格，中国广电坐拥号称黄金频段的 700MHz，但如何利用 5G 牌照来发挥出自身更大优势也是个不小的考验。

5G 牌照正式发放首先带来的是运营商用于 5G 网络建设的资本开支的上调。三大运营商发布 2018 年财报

时均公布了 2019 年度 5G 资本开支计划，其中中国移动 2019 年“5G 试商用”资本开支预计在 172 亿元之内；中国联通计划 60 亿—80 亿元用于“5G 试验资本开支”；中国电信明确表示 2019 年的 5G 投资预算为 90 亿元。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大运营商今年三月份公布其资本开支计划时，相对应的 5G 时间表还是 2019 年试商用和 2020 年全面商用。

随着 5G 牌照正式发放，三大运营商 2019 年的 5G 资本开支计划也面临着网络建设由“规模试验”、“规模试商用”向“全面商用”的相应调整，并将影响到 2020 年的资本开支计划。

参考下图所附三大运营商历年资本开支情况来看，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3 年 12 月和 2015 年 2 月发放 TD-LTE 和 FDD LTE 商用牌照之后，三大运营商在 2014 和 2015 年的资本开支成为近六年来的最大峰值，所以可以预计三大运营商将在 5G 牌照发放后的 2019—2021 年间迎来又一个网络升级换代的投资高峰期。



也就是说，三大运营商拿到了 5G 牌照不仅意味着他们站在了 5G 网络部署的制高点上，同时他们也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最明显的就是资本开支的上调，在中国移动最新发布的 2019 年第一季度运营数据报告中，由于受到收入同比下降、刚性支出持续增加影响，2019 年首季度税前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8.6%；中国联通 2019 年首季度税前利润虽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9.2%，但主要得益于“近年资本开支的良好管控”、“自由现金流助力带息债务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和“网络、运营及支撑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等“节流”措施所致。

随着 5G 牌照正式发放带来的 5G 资本开支的上调，刚性成本支出和财务成本的上升将不可避免地对三大运营商的利润业绩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当然，5G 牌照的发放，也将推动三大运营商将 5G 商用服务提前推向市场并由此带来新的业务收入。此前，三大运营商已开始基于其 5G 试验网络向社会招募“5G 友好用户”；拿到商用牌照之后，运营商将可以正式为 5G 商用服务设计资费套餐，从首批尝鲜的 5G 用户身上获取相应的通信服务收

入。

除此之外，三大运营商还将扛起更大的运营责任。中国的 4G 商用已走过近 5 年的历程，截至今年 4 月底 4G 用户规模已到达 12.1 亿户，但渗透比例仅有 75.9%，中国三大运营商的现网上还存在着 1.3 亿 3G 用户和近 2.5 亿 2G 用户。在 5G 牌照发放后，三大运营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范围内将四张网络并行、四代用户兼营。

中国在 5G 方面的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注定了这条路走起来不那么容易，三大运营商面对的仍将是一段负重前行的旅程。

### 通信设备厂商：输赢各不同

通信设备厂商无疑是 5G 牌照提前发放的最大受益方。当年我国 4G 牌照发放在 2014 和 2015 年带来的大规模 LTE 网络建设极大促进了华为、中兴、诺基亚和爱立信在中国区业务收入的增长，但随着 LTE 网络建设高峰期（2015—2016 年）的结束，通信设备厂商无一例外从 2017 年开始步入行业的寒冬。



随着三大运营商获得 5G 牌照后启动 5G 网络的规模建设，参照上图当年部署 4G 基站的建设节奏，预计 5G 基站的市场需求将在 2020—2021 年间达到峰值，由此通信设备厂商将彻底结束青黄不接的“4G 寒冬”而步入生机焕发的“5G 春天”。但 5G 牌照提前到 2019 年发放，对于三大运营商在 5G 组网方式选择上所产生的影响，却直接导致了通信设备厂商的输赢各异的不同命运。

针对 5G 网络的建设和部署架构，3GPP 定义了非独立组网（NSA）和独立组网（SA）两种标准选项，三大运营商都将能支持 mMTC 和 uRLLC 等全新业务场景的 SA 架

构组网作为 5G 的目标网络，但受限于 SA 标准冻结时间较晚而导致的产业链不成熟，目前均在同步推进 NSA 和 SA 的规模试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 5G 牌照的发放时间提前到近期，意味着三大运营商将只能在 2019 年选择 NSA 的组网架构来启动 5G 商用网络的建设。

NSA 就是利用现有 4G 网络实现 5G 宽带应用，因此 5G NSA 建网需要锚定原有 4G 无线网络，则维持原有 4G 供应商格局成为必然，这对于在三大运营商 4G 网络上占据了近 8 成市场份额（海外咨询机构 HIS 统计结果为 77%）的华为和中兴而言，无疑是绝对的利好。

5G 牌照发放后，华为官方宣布其面向全球市场的 5G 基站发货已超过 10 万个，这其中就有部分 5G 基站是以预发货的形式供给了国内的三大运营商进行 5G 试验以及试商用的提前部署。三大运营商拿到商用牌照之后会尽快启动 5G 网络建设的招标采购，华为预计仍将延续其在 4G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而取得份额最大的 5G 商用合同，在新增 5G 合同发货带来更多 5G 收入的同时，也可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回笼前期的国内 5G 预发货货款，获得宝贵的现金流支持。

此外，占据国内 4G 网络绝对市场份额的华为和中兴也将在运营商的 5G 招标采购中，因 NSA 组网的绑定优势而获得议价权上的主动，从而取得 5G 商用合同的利润最大化。同样，借助 NSA 组网的绑定优势，在国内 4G 网络上拥有相对市场份额的国外厂商诺基亚和爱立信基本上也可以确保其在中国 5G 市场布局中的合理位置，特别是在工信部明确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 5G 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共同分享我国 5G 发展成果”的官方背书之下。

然而，5G 牌照提前发放而导致三大运营商只能选择 NSA 的组网架构来启动 5G 商用网络的建设，对于在国资委主导下刚刚完成央企合并的中国信科来说却没那么乐观。中国信科合并的初衷就是借助烽火产业能力和大唐的研发实力谋求在 5G 上扭转当年在国内 4G 市场上颗粒无收的窘迫境地，如 5G 牌照按原计划在 2020 年 SA 产业链成熟之后发放则运营商将有意愿独立于 4G 新建 SA 架构的 5G 网络，这本来可以为中国信科提供一个在 5G 时代崛起的竞争机会，但 5G 牌照的提前发放则不利于实现中国信科在国内 5G 网络市场谋求一席之地的梦想。

同遭打击沦为输家的还有一直蠢蠢欲动希望借助 5G 进入中国通信设备市场的三星电子。在咨询机构 Dell’Oro Group 最新发布的相关报告中，三星电子因为在 5G 先发市场韩国和美国借助本土优势和盟友优势取得了不俗的市场份额，从而在 5G 基站出货量和销售额上暂时取得了市场第一的排名。但随着我国 5G 牌照的发放和大规模网络建设的启动，华为、诺基亚、爱立信和中兴会由此迅速完成对三星电子的碾压，从而将通信设备厂商的 5G 排名拉回到传统格局。

但与通信设备厂商在 5G 牌照发放后将迎来生机焕发的 5G 春天不同，5G 牌照在短期内带给手机终端厂商的却可能是一个考验。目前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 114 部/百人，日趋饱和的手机市场缺乏性能带动的刚性换机需求，因此，各家手机厂商只能以更炫的外观、更酷的功能等翻新花样频频推出 4G 手机新品，来吸引手

机用户消费升级，弃旧换新，力争在白热化的厮杀竞争中不掉队。随着 5G 牌照的发放，出于新一轮升级换代的刚需预期，手机用户对于 4G 手机的更换将更为谨慎，市场上持币待购“下一代不过时的手机”心理的加重将严重影响手机终端厂商的 4G 手机出货量，特别对于那些在 2019 年上半年刚刚推出 4G 新机型的厂商而言，在市场推广重心将在下半年转向 5G 手机的背景下，其前期投入的广告营销费用将面临打水漂的风险。

同时，虽然市场推广中心将在下半年转向 5G 手机，但短期内 5G 手机的上市销售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价格。为在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取得先发优势，以华为、小米、OPPO 为首的国产手机厂商很早就在 5G 手机研发上投入了重兵和重金，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首批上市的 5G 手机需要承担的研发成本的摊销，同时由于手机量产有一个爬坡过程，初期小批量的元器件采购也将加大 5G 手机的制造成本，如果再加上市场培育所需的营销推广成本，初期上市的 5G 手机预判将集中在 5000—8000 元区间，这是个较高的价格。

其次是芯片供应。5G 手机与 4G 手机的最主要区别是基带芯片，与 4G 手机的基带芯片有高通、华为、联发科乃至展讯等多家竞争逐步拉低芯片成本不同，目前可供商用的 5G 手机基带芯片只有华为的 Balong5000 和高通的骁龙 X50 两种，由于华为的芯片仅限于自用，因此大部分手机厂商的 5G 手机生产和上市将严重依赖高通的供应能力。

此外还有产品成熟度的考验。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的 5G，从技术标准、网络架构到芯片能力是针对整个产业链的全新挑战，因此投向最终用户市场的 5G 手机，也需要在不断的网络测试、用户体验、产业链磨合中才能逐步走向成熟。

综上所述，5G 手机很难在短时间内成为普及的电子消费品，其出货量可能是一个爬坡过程，参照下图所示 4G 牌照发放后 2014 年间的 3G 和 4G 手机出货量占比变化情况，可以预见在 5G 牌照发放后，从 2019 年下半年到 2020 年下半年的 18 个月区间内，4G 手机销量的下滑与 5G 手机销量的爬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期间众多手机厂商可能会倍感压力。在此 18 个月的区间内，那些没有通信技术积累无法向 5G 转型的手机厂商将被市场淘汰，而那些率先向市场推出 5G 手机的先行者在不断调整身姿后，则会为自己争取到更大的存活空间。

#### 普通用户：买单意愿暂不强烈

由于 5G 牌照提前发放而选择 NSA 的组网架构来启动 5G 网络建设，因此我国 5G 的应用场景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仍将以面对广大手机用户的消费类应用为主。只有随着 5G 网络架构向 SA 的演进，真正发挥 5G 高可靠、低时延、海量连接特点的 mMTC 和 uRLLC 应用才可能在垂直行业拓展到产业场景。

因此，对于广大手机用户而言，其可接受的 5G 的最大卖点就是 eMBB 速度快。业界面向大众市场推广 5G 最爱举的例子也是下载一部 2 小时的高清电影，4G 需要 40 分钟而 5G 只需要 1 秒钟。但“速度快”的好处很容易转化为“用不起”的顾虑。英国 BBC 电视台在使用 5G 网络直播运营商 EE 商用 5G 的报道中，给普通观众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无抖动的镜头外，就是事先预备的流量不够用而数次中断直播的尴尬。因此速度更快的 5G 资费套餐设计将成为最终用户选择 5G 服务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速度快”的 5G 能用来做什么是与可接受的资费水平相互影响的因素。正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言人闻库所说，“建得好不是 5G 的目的，用得好才是 5G 的真正目的”，运营商在 5G 网络测试阶段经常用于市场造势的应用如超高清视频、远程医疗、沉浸式游戏等适用于家庭或个人的 5G 案例，其实在室内场景均可以通过千兆网宽带更容易得到更完美的实现。因此，在 5G 网络商用后运营商

与相关合作方能否尽快找到 5G 的“杀手级”应用来催化市场，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用户是否会为 5G 买单的意愿。

中国新闻网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发起了一个“5G 商用牌照下发后，你会立刻换 5G 手机吗？”的小调查，在截至目前 3.2 万人的投票选项中有 33.2% 的用户选择“观望，等等再说”，另有 48.9% 的用户因为顾虑于 5G 手机价格高和 5G 应有场景不明确而投下反对票。这充分反映了普通民众接受 5G 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5G 牌照发放后，5G 用户的渗透率将是衡量 5G 商用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这代表了 5G 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和考核运营商在 5G 建设和运营上投入的回报指标。如何打消手机用户的观望态度将是整个通信业界首先需要克服的 5G 最大挑战。5G 正式发牌，只是 5G 商用进程迈出的第一步，当前冷暖不均的市场业态也是 5G 起步阶段的必经过程。展望 5G 发展漫长的未来道路，在看到其巨大前景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投资压力、技术难题、市场认可等一系列挑战。要推动 5G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更需要包括通信运营商、通信设备商和手机终端厂商等所有产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来携手应对。

(2019-6-11 瞭望智库)

(上接第 7 页)

非常依赖旋转门。人才流动是对的，但中国不能因学美国而建‘旋转门’，而是应着重研究如何解决退休官员发挥余热的问题。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国际关系中心主任 David Zweig 指出：中美之间的摩擦其实质不是贸易问题，而是科技竞争。中美之间的摩擦其实质并不是贸易问题，而是科技层面上的竞争。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使美国提高了警惕。美国作为全球的霸主是不可能允许崛起中的中国在科技领域超过自己，所以通过其行政手段来限制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美国对于中国的警惕迫使美国政府已经从过去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转变为现今的非接触政策，许多原来的合作因为当下的政治环境而产生了脱离。

全球化智库 (CCG) 副主任高志凯指出：理解中美智库间的合作，首先需了解两国关系恶化的程度。要理解中美智库间的合作，首先需要了解两国关系恶化的程度。

现今美国政府以国家力量针对中国个别企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有一天中美关系更加恶化则可能会导致智库间的合作产生巨大问题，如果对大背景没有一个很切实的把握，那么谈论智库间的合作则将具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由全球化智库 (CCG) 发起，旨在关注全球智库行业在发展与创新领域新趋势，促进全球智库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间的交流合作，以更好地承担当代智库的历史使命。作为在中国举办的全球智库论坛，“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至 2019 年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全球数十个国家、国际组织，上百家智库，数百名海内外战略、经济、商业领域的研究机构和团体代表参与了往届活动。“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已形成国际会议品牌，就智库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展开思想碰撞，凝聚全球智库共识，积极探求前瞻性、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2019-6-6 搜狐网)